

小小说

仗酒杀敌

顾振威

高玉森是鹿邑县城的铁杆汉奸。高玉森本是个教书先生,他面色青白,身材修长,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高玉森以花之君子莲花自比,常摇头晃脑地吟诵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东北战事一起,高玉森又以高山青松自喻,还说“时人不识凌云木,直待凌云始道高”。高玉森在人群聚集处口若悬河地宣讲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唾沫四溅地高呼“此危难之时,大丈夫当战死沙场,马革裹尸”。

说得倒是义正词严、慷慨激昂,谁也没想到他会被日本鬼子的隆隆炮声吓破胆,原本笔挺的身板一夜之间变得佝偻了。小鬼子在鹿邑修了炮楼后,高玉森常弯着身子往炮楼里钻,手里不是掂着烧鸡,就是提着羊腿,要不就是烧饼油条。

小鬼子爱听曲儿,高玉森就跟走街串巷的盲人学曲儿;小鬼子爱喝酒,高玉森就用家里本就不多的小麦、小米、玉米、高粱,以及涡河的清泉酿酒,甜绵爽净、奇香扑鼻,饮用后浑身发暖、神清气爽。这种酒度数低,酒量一般的人喝个半斤八两也不会醉。

小鬼子很快就喝上了瘾,经常让高玉森送酒,还夸赞高玉森是大大的良民。

妻子玉芝却不愿与“良民”过了,在苦劝无效后,抱着孩子回了娘家。

后来玉芝让娘家人拉走了嫁妆,与高玉森来了个一刀两断。

“也好,走就走吧。”话虽这么说,高玉森却把自己灌得大醉,哭得跟泪人一样。

玉芝走了,没人在耳边絮叨了,高玉森佝偻着身子,往炮楼跑得更勤了。

尽管日本兵夸赞高玉森是大大的良民,他们对高玉森的警惕性却极高,不让高玉森碰炮楼里的枪支弹药,高玉森送去的食物也让他先尝。日本人不相信高玉森,小城的百姓更不相信高玉森,见了他不是躲得远远的,就是往地上吐唾沫,没一个人愿意跟他说话。

有一次高玉森喝醉了酒,跑到三爷家里哭得天昏地暗:“三爷,我心里难受啊!你说,他们如狼似虎,有枪有炮,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,能做什么?”

三爷怒目圆睁,声如洪钟:“人不可有傲气,但不可无傲骨。亏你是个读书人,辱没了读书人的斯文,读书人的脸面都让你这号人丢尽了!你给我滚!”

八月十五到了,高玉森不顾众人的怒目而视,左手拿着二胡,右手抱着酒坛子,大步流星往村外的炮楼走去。到了炮楼,见了小鬼子,高玉森伤感地说:“今天是八月十五,是中国的传统佳节,是个与家人团聚的日子。你们远离故国,都思念亲人,我就给你们唱唱苏轼的‘明月几时有’吧。”

高玉森唱得如泣如诉,小鬼子听得泪流满面。何以解忧?唯有美酒。他们端起高玉森倒的酒,咕咚咕咚喝了起来。小胡子少尉还算清醒,瞪着眼喊:“都不能喝多,还按以前的规矩,不超过半碗!不超过半碗,咱们就都清醒,就能对付偷袭的八路。”

每人半碗,大半坛子酒被十四个日本兵喝了个一千二净,他们很快就醉如死猪。精通中国话的小胡子少尉倒在地上时还咕咕啾啾:“奇怪了,这酒,怎么这么有劲儿?”

他们到死也不会知道,这种酒出酒时如果接得长(水多,酒精含量低),也许可以喝个三斤二斤的,但如果接得短(水少,酒精含量高),就只能喝个三两二两。这种酒看似没劲儿,其实后劲儿挺大,知道喝多有点头晕时已经晚了,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。

饱读诗书的高玉森已将这件事谋划许久,他以前拿来的酒接得道长,这次接的酒最短,按当地话这就是“酒头”,难怪小鬼子只喝半碗就倒在地上了。

高玉森眼前闪着玉芝哀怨的面孔,闪着倒在血泊中的父老乡亲的面孔,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,他拿起刺

刀,狠狠地向鬼子刺去。

一个倒在血泊中的鬼子挣扎着拉动了枪栓……

这天,村里人都听到了从炮楼里传来的这一声枪响。随后,一切都归于沉寂。

第二天,城墙上高吊着高玉森被鲜血染红的尸体。

一个文文弱弱的教书先生一下子干掉十多个鬼子,这在鹿邑引起的震动丝毫不啻于地震。人们很快就知道了高玉森的真实身份。原来,他三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他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作掩护,投敌人所好,接近敌人,为游击队员提供了很多情报。

铁匠知道真相后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:“我真该死,那天高玉森来打一把大刀,我把他轰走了。我咋没给他打一把大刀让他多杀几个鬼子呢?”

三爷闻讯,禁不住泪流满面:“‘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’英雄!我看高玉森就是咱们的英雄啊!”

铁匠和一帮热血青年放下锄头,加入了抗日游击队。

唱戏的瞎子敲着大鼓,高唱:“东北战事起,民族危难生。壶里乾坤大,杯中日月长。谁说喝酒会误事?我看酒壮豪气生。武松喝酒打猛虎,玉森仗酒杀敌兵……”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

鹭影清涟

解朝中 摄

随笔

你是尘埃你是光

郭西开

我家种了几十棵桃树。每逢桃子成熟时节,最高兴的莫过于父亲了。他总是匆匆忙忙吃过饭,早早地来到桃园,眯缝着眼,高昂着头,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劳动成果,每一条皱纹里都夹着一丝笑意,如春光般明媚,并不魁梧的身躯在阳光的斜照下显得庄严肃穆。

父亲又准时在凌晨一点钟起床,喊醒睡得昏沉的我和他一起去城里卖桃。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,胡乱洗了脸,来到父亲的车旁,一声不响地坐了上去,又接着打起了盹儿。再次被父亲叫醒,我发现已经到了灯火通明的集市。

父亲刚找好摊位,摆好几筐桃,一位略带疲倦的中年人一边打着哈欠,一位向我们走来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指着桃筐问道:“桃子多少钱一斤?”父亲急忙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香烟,递到中年人手里,客客气气地说:“一块二。”中年人接过香烟,并没有马上放到嘴里,他用另一只手拍拍桃筐,又摸摸桃子,拿起一个放在鼻子下闻了闻,说:“很新鲜,是才摘的。能不能便宜点儿。”父亲已经把打火机拿在

手里,并没有立刻给中年人点上,有点讨好似的说道:“桃子是新鲜的,价格也公道。要不你尝一个?”中年人眼圈发黑,脸色泛黄,极不耐烦地摆摆手,对父亲说:“一块钱一斤。你要同意,我要三筐。”说罢,抬脚欲走。父亲很是犹豫,他知道每斤少卖两毛,三筐就得少卖三四十元,但要是不卖,桃子很快就不新鲜了,再加上管理费和卫生费,更是不合算。他眉头紧锁,一只手不停地挠头,也忘了给人家点烟。我灵机一动,有了一个想法,赶紧对父亲说:“爸爸,咱们同意卖了。卖完我还要回去上学呢!”父亲听后一愣,扭着头疑惑地看向我,刚要说些什么,中年人便催促他赶紧称重。父亲看着我,犹豫了几秒钟,一跺脚,说道:“好,那就卖给你三筐!”说完,他给中年人点上烟,又搬了三筐桃,让我称重。我拿起秤杆,和父亲抬着桃筐称了重,然后去拿本子和铅笔。我斜眼看向那位中年人,发现他并没有注意我,而是在和旁边一个卖西瓜的讨价还价,便迅速在本子上算出了价钱。我拿着本子,对他说:“叔叔,称好了。一共

二百六十斤,二百六十块钱!”中年人扭过头,竖起大拇指,微笑着对我说:“小朋友,不错啊,速度挺快的。你们帮我搬到车上吧!”我骄傲地转过脸,想向父亲炫耀,却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了诧异。他踌躇了一会儿,听到中年人催促,没再多想,赶快把桃筐搬到了车上。

中年人走后,剩余的几筐桃子很快被卖掉,但父亲的脸色并不如我想象的轻松,反而越来越凝重,几次张口想和我说些什么,但都被买主打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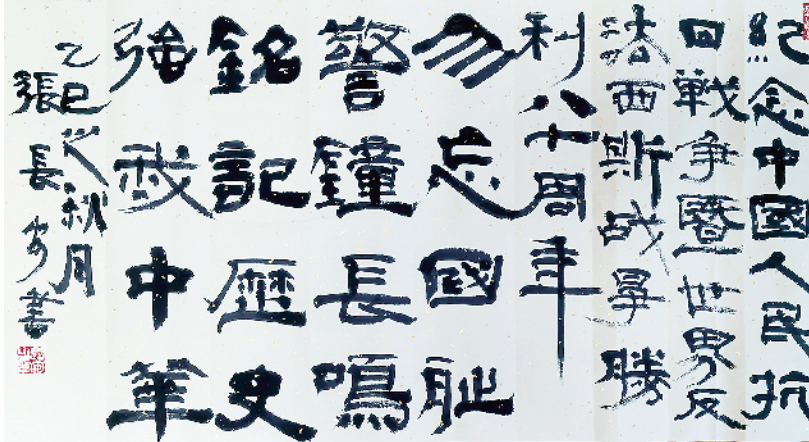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筐桃卖出后,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拿着钱袋晃来晃去。这时,父亲默默地把空筐放在车上,转过身,脸色铁青地盯着兴高采烈的我。我有些心虚,手足无措,嘴唇紧闭,不敢有一丝声响,也不敢看父亲一眼。我知道,长年做生意的父亲对一筐桃子的重量心中是有数的。这寂静的一瞬间宛如漫长的几个世纪,我心中悔恨交加。终于,父亲开口了,他严厉地问道:“说,怎么回事?”我感觉父亲从来没有如此生气过,但也知道隐瞒不住,便小声地答道:“他跟咱们

讨价还价,想让咱们少赚几十块钱,我就在称重时多给他报了三十多斤。”说完,我偷偷地看向父亲,发现他的脸色在灯光映照下更加难看。半晌,他突然夺过我手里的钱袋,快速地数出一些钱,头也不回向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去。看着步履匆匆的父亲走进来来往往的人群,我愈加羞愧。

夜幕终于退去,在我的忐忑不安里,父亲踏着晨光回来了,脸上有如释重负的轻松,头发上的汗珠在晨光中跳跃着。他走到我面前,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说:“做生意允许讲价,但不能欺骗。挣钱重要,有些东西比挣钱更重要!”我羞愧得无地自容,脸上发烫,仿佛看到那个中年人竖起的手指在晨曦中变成了嘲笑。

此后,在成长的道路上,每当我走到岔路口,心有困惑的时候,便会想起父亲的话。

平凡如尘埃,在人群中谁也不肯多关注一眼的父亲,如一道光,穿透厚厚云层,照耀万里寰宇,照到我内心的黑暗之处,在我心底放射出万丈光芒!



张长安 书

杨脑村的地下党员

——回忆王文芳老师

戴涛

王文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周口市委员会委员,她曾以教员身份作掩护,在杨脑村建立了地下党支部,进行革命活动。让我们沿着她的足迹,穿越那段峥嵘岁月,探寻发生在她身上的动人故事……

1939年2月,王文芳来到周口杨脑学校任教,教授音乐和语文。她精心选讲《最后一课》《梦见妈妈》等饱含家国情怀的文章,带领学生朗读,教授《流亡三部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保卫黄河》等革命歌曲,并讲述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,以此激发学生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。

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、壮大革命力量方面,身为杨脑村人的王文芳,凭借这一便利条件,积极向村民宣讲革命道理。她先后发展李歌功、李青田、杨福堂、张大成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吸收李国干和李铭功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。她巧妙利用李铭功和李国干年纪小、不易引起注意的特点,多次指派他们秘密前往周口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,领

取学习文件与宣传材料。

此外,她还以先锋队员和年龄稍长的学生为骨干,组织儿童团,每晚集中学习,宣传抗日理论。

王文芳频繁搜集情报,保持与上级党委的密切联系。她曾多次向时任市委书记白毅之送交文件或信件,并带回书籍与宣传小册子;也曾前往黄楼学校送信,交到时任市委宣传部长韩若雪手中;还曾到胡家集街西的黄家席行,将信件交予黄知菊同志。

1944年5月底,日寇占领周口,当地汉奸组建维持会,区队部也相继成立。这群人认贼作父,卖国求荣,加之沙河决口,洪水淹没房屋土地,周口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在王文芳和韩若雪的指示下,李铭功赴周口散发标题为《你的脸皮在哪里》的传单,揭露汉奸组织的丑恶嘴脸。

王文芳等人带领的杨脑学校抗日宣传队积极开展救亡活动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。许多进步青年受其感召,毅然奔赴抗日前线。

1948年,随着“拉锯”局面的结束,周口彻底解放。王文芳与韩若雪等同志,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


一名基层通讯员的成长足迹

阎汝山

《周口日报》创刊至今,作为乡政府的一名通讯员,我对她可谓情深意笃。

尽管当时写作条件很差,身边也有不理解的人对我冷嘲热讽,但我对《周口日报》仍然痴情一片,笔耕不辍,因为每次我去报社送稿,都会得到编辑老师的热情接待和指导鼓励。

为了提高撰稿质量,报社经常举办新闻写作与摄影培训班,我每次必到。渐渐地,我的写作知识增长了,撰稿质量提高了,还锻炼了意志,陶冶了情操,提高了素质,增强了工作能力。

我写新闻稿件,拍摄新闻图片,还创作文学作品,每年都在省、市、县级新闻媒体发稿近百篇,且好稿优稿逐渐增多。1996年11月18日,我采写的《治乱、治瘫、治穷,朱集乡抓稳定促发展》一篇在《周口日报》一版头条发表,我也受到了县委宣传部的嘉奖。

在摄影培训班中,我学会了拍

摄新闻图片,每年有数十张摄影作品被省、市、县级媒体采用,有的还上了报纸头版。2001年,朱集乡大雷楼村举办养羊大赛,我拍摄的新闻图片《羊披彩带人挂花》,在《周口日报》一版发表。2003年3月,《周口日报》一版发表了 my 的摄影作品《李元民利用大棚育苗致富》,河南电视台的记者看到后,专程来朱集拍了专题片。退休后,我经常写散文、随笔投给《周口日报》。与《周口日报》共同成长的过程中,我多次获市、县先进宣传工作者和优秀通讯员荣誉称号,并光荣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。

我笔耕不辍,把无限的爱融入于写作之中,这让我深刻体会到,新闻写作有苦有乐、有酸有甜。

《周口日报》创刊35周年之际,我在日记中写下感怀:
业余报道三十年,
酸辣苦甜只等闲。
我与日报同成长,
无限乐趣在其间。

